

三线建设——宏伟深远的超级战略工程

“三线建设”是党中央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一场从 1964 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内地省份进行的以“备战备荒”为目的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电力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

一、“三线”释义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 1964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 13 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所谓“三线”，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实际上，三线建设的重点是八省一市，即：云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全境以及河南、湖北、湖南的西部地区。

粗略从行政区划看，一线地区：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新疆、

西藏。三线地区：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的腹地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地区，就是二线地区。

同时，地处一线二线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属的“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由省国防工办领导，生产半自动步枪、7.62毫米中间威力步枪弹、手榴弹、引信、迫击炮弹、重机枪、中小口径迫击炮、火箭弹、火箭筒、高射机枪、无后座力炮，也就是步兵营连级的火力。力争做到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省自为战”坚持抵抗。黑龙江的小三线是阿城和尚志，吉林的小三线是辉南，辽宁的小三线在朝阳凌源；河北的小三线沿太行山麓，山东的小三线是沂源，河南的小三线是济源；湖北的小三线是襄阳，湖南的小三线是娄底；广东小三线是连江，广西小三线是河池；安徽小三线是六安，上海小三线是皖南，江西小三线是万载和安福；福建小三线是三明，浙江小三线是云和与龙泉，江苏小三线是盱眙；新疆的小三线是和静县阿拉沟，甘肃小三线是平凉。

总而言之，三线建设的核心地区在西北（包括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和西南（包括现在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

二、时代背景

三线建设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它从决策形成到付诸实施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局势越发严峻。1956年之后，中苏由于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分歧，引起了苏联极大不满，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欠下的债务，并且苏联还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随着

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 7300 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并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地区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印度、日本、南朝鲜(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

1962 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1964 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

1964 年 8 月 2 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出动第七舰队 125 艘军舰和 600 余架飞机。5 日,美国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将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1969 年,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 54 个师、近百万人,并与我国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国际形势的演变,导致我国“三五”计划从“解决吃穿用”改为开展“三线建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认为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可能爆发战争。而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过于集中,14 个一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 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 52%的国防工业;大城市人口过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遭破坏。三线建设,就是试图改变这个面貌,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

三、发展过程

外有强敌，内有隐患，这引起了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要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三线建设。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三线建设的决议。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还要进洞（简称山、散、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三线建设最大的特点是国家投资向三线地区转移。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呈送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中提出，一切新的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现有续建项目，除了明年，后年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一线二线的现有企业，能一分为二的，能搬迁的，要搬迁到一部分到三线去。根据1965年通过的《汇报提纲》的安排，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比例占全国的42.2%。在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总投资的74%。

出于国防的考虑，三线建设项目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这个原则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来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来的，用以指导部分机密性高的军工企业选址。但后来成为一切三线企业的选址要求。而且这个要求也在不断朝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隐蔽”的基础上，提出对于某些敏感企业“必要时进洞”。后来就直接变成“靠山，分散，进洞”，即“山散洞”。大量项目被迫打洞，

造成大量损失。比如贵阳一个电子元件厂建在山洞内，山洞阴暗潮湿，造成生产的电子元件不能达到标准。部分企业过分强调分散，对生产造成困难。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 28 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 7 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 6 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运送，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陕西新建的 400 多个三线项目，将近 90% 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 48 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其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更有些企业，由于选址困难，很多厂矿迟迟不能建成投产。更多的企业由于远离原材料或者处于不利的地理环境，导致效率低下。比如川东造船厂处于现在重庆市涪陵区靠近长江的山区内，在 70 年代建成投产后负责生产常规动力潜艇。潜艇生产出来后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潜，需要有驳船拖至 2000 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长江口才能下潜。

由于时间仓促，很多三线企业遵循“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原则。中苏交恶以后，苏联撤回援助的专家团，三线企业不得不依赖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这些原因共同造成许多三线企业出现设计缺陷。比如当时中国最大的葛洲坝水电站由于设计缺陷不得不停工两年。80 年代以后，因为有“严重设计缺陷”，国家又在成昆铁路线上花费了上千万资金来弥补这些缺陷。酒泉钢铁基地直到 1980 年尚且不能产钢。如此问题不胜枚举。这些问题也成为了 80 年代以来三线企业大量倒闭的根源之一。

除了新建重点项目，大量三线企业来自于一二线地区企业的拆分搬迁，称为“一分为二”。1965年12月1日，国家经委发出《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提出“一分为二”工厂的“关键、专用设备，应当首先满足三线的需要，有两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坚决搬走。但是如果时间上来的及，可以做一套支援三线”。“一分为二”的工厂，“应该挑选优秀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成套输送，优先满足三线需要”。搬迁地点的确定，一是战备需要，在比较分散的腹地和山区；二是根据当地已有的生产条件，与相似企业合并；三是照顾到将来当地的经济发展，填补一些空白。据统计，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计划结束，全国约有380个项目，14.5万名员工，3.8万台设备从沿海迁往内地。实际上，加上未统计在内的国防工业科研单位和地方自行规划、计划外的迁移项目，及随同迁移的项目和人数都远超过上述数字。这些企业大多来自上海、北京、沈阳、大连、天津、南京等东北和东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铝加工厂由哈尔滨101厂搬迁职工1700人、设备3400吨；兰州轴承厂由北京轴承厂搬迁职工800人、设备333台；天水风动工具厂由沈阳风动工具厂搬迁734人、设备214台；甘肃光学仪器厂由南京、上海、陕西、哈尔滨的五家工厂和研究院所搬迁1990人。

除企业外，学校、科研机关也有计划地迁移了一部分。由原校迁出部分专业到三线地区建立的学校有：北京大学分校、清华大学分校、南京大学分校、华东化工学院分校、北京航空学院分院、北京工业学院分院、甘肃工业大学等7所高校。

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将建设重点定在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

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铀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四、大背景下的银川三线建设

宁夏的三线建设,脱离不了时代的大背景以及国家西北建设思想的宏观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西北出现了两次经济开发的高潮。第一次是50年代以“一五”计划为中心的新工业基地建设,第二次是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两次经济开发对包括宁夏银川在内的西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三线建设。

(一) 冶金工业

1974年,上海市与宁夏合办铁合金厂,由上海提供资金和设备发展硅铁生产。该项目于1976年开始建设,第一台矿热炉于1978年9月投产。1970年建起了宁夏第一家独立的耐火材料厂——贺兰县耐火材料厂,于1971年5月建成投产,产品主要是黏土耐火砖,年生产能力为2.55万吨。

(二) 石化工业

1958年至1960年国家与宁夏地方政府相继投资570万元,先后在银川市建成了银川磷肥厂、宁夏农垦磷肥厂、银川橡胶厂等化工企业,为自治区的石油化学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化学工业部所属青岛橡胶二厂和沈阳橡胶三厂部分搬迁到宁夏,在原银川橡胶制品厂的基础上扩建,到1966年建成西北地区最大的轮胎生产企业。同年银川氮肥厂建成投产,开创了宁夏氮肥生产的历史。1970年,银川化肥厂建成投产后,宁夏陆续建成贺兰、灵武等7家小化肥厂和银川、贺兰等6家小磷

肥企业，为银川化肥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66-1978年间，银川胶带厂、银川长城橡胶厂、银川前进橡胶厂等小型橡胶加工企业也相继建成投产。1979年11月，银川橡胶厂被国家有关部门确定为全国重点化工生产企业，橡胶类50个重点企业之一、轮胎类15个重点企业之一。

（三）仪器仪表工业

1965年，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简称一机部）仪表局决定在宁夏建立生产试验机的青山试验机厂、生产执行器调节阀的吴忠仪表厂、生产工业自动化仪表的银河仪表厂和生产微型试验机的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这些建设项目分别由北京、上海、大连、天津等仪器仪表基地抽调职工和设备支援青山试验机厂、吴忠仪表厂、银河仪表厂、吴忠微型试验仪器厂，并担负包建、援建任务。宁夏仪器仪表工业有计划、高起点的发展时期由此揭开序幕。

1968年，自治区根据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会议精神，由地方投资在银川市区建立生产电子测量仪器的宁夏电子仪器厂。1970年由天津电表厂内迁部分技术力量，在银川建设西北地区开关板电表主导厂的银川电表仪器厂，相继开发生产出测震仪器、农林气象和植物生理测试专用仪器。

（四）机械电子工业

青山试验机厂于1965年由北京仪器厂搬迁到宁夏青铜峡筹建，隶属一机部管辖。1966年2月建成投产，生产10个品种试验机340台，完成工业总产值137.4万元，实现利润7万元。1990年青山试验机厂由青铜峡市搬迁至银川市中山北街。

银川通用机械厂是银川起重机器厂的前身，最早起源于民国时期兴办的兰鑫机械厂，始建于1958年。1965年由大连起重机器厂内迁职工和部分设备到银川机械修配厂支援宁夏建设，当年形成生产能力20世纪70年代开始试制并生产了桥式起重机。

大河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一机部的决定，将沈阳中捷友谊厂

搬迁到宁夏中卫建立的。搬迁当年就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搬迁、当年生产”的建厂方针。由于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曾多次受到一机部的表扬。1970年9月，一机部将大河机床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1986年，大河机床厂搬至银川市。

长城机床厂是1965年根据国家一机部的决定，从大连机床厂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到宁夏建厂。在边搬迁、边建设、边生产中，当年装配成功C720K液压仿形半自动车床，这是建厂生产的第一台机床。1966年，该厂又设计生产出CD7112型仿形车床，这是它的第一个定型产品。1970年，一机部决定将长城机床厂由部属企业下放宁夏地方管理。

长城机床铸造厂是根据一机部的决定，由沈阳中捷友谊厂和大连机床厂派员于1966年9月在银川市新市区开工兴建。1970年正式投产，向主机厂提供机床铸造毛坯。

西北轴承厂是按一机部的计划于1965年开始筹建，当时定名为西北轴承总厂（总厂的概念包括西北地区4个厂，即兰州轴承厂、天水海林轴承厂、西北轴承一厂和西北轴承二厂）。1966年6月由辽宁瓦房店轴承厂包建并搬迁部分人员和设备，在平罗县境内贺兰山大水沟动工建厂，隶属一机部管理。1969年一机部撤销西北轴承总厂筹建处，1月7日正式改名为西北轴承厂，1970年9月下放改为自治区区属企业，1971年8月正式投产。1987年西北轴承厂厂部由平罗大水沟迁到银川市新市区厂址。

宁夏标准件厂前身是一机部搬迁配套生产机床的机床一厂、机床三厂、机床锻造厂，于1971年初改名银川机床附件厂。1972年4月，根据国家计委、一机部通知，从天津标准件厂、材料改制厂、螺纹工具厂、生活服务站等单位分迁部分设备和人员组建宁夏标准件厂。1972年，银川机床附件厂与宁夏标准件厂合并扩建，厂名为宁夏标准件厂。

宁光电工厂于 1968 年 9 月根据国家计委、国防工办的决定，将纺织部所属银川新立织造厂移交四机部改建半导体器件厂，定名为宁光电工厂，初设计规定的产品大纲是为雷达、指挥仪、电台和计算机配套。20 世纪 70 年代初，主要生产硅小功率晶体管、硅小功率开关管等。

宁夏兴庆机器厂由宁夏计委批准筹建，1967 年 6 月动工，1970 年 4 月落成，设在距银川市老城区 45 公里处的贺兰山榆树沟内。是宁夏唯一的小三线军工厂，也是国家国防科工委 1984 年小三线调整方案确定保留的全国 93 个地方军工企业之一，防步兵地雷定点生产厂。

1970 年 4 月，自治区筹建宁夏汽车配件厂，厂址选在银川市贺兰山腊塔沟。1972 年 8 月，初步形成了一定生产能力。1976 年，改名为宁夏交通机械厂，1979 年迁到新市区。

1968 年，筹建银川汽车配件厂。

1972 年建设银川市电器厂，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机械电子工业部在西北地区生产高、低压电器和配电成套设备的专业制造企业。

1966 年 7 月建设贺兰电机厂，1981 年 8 月改为宁夏电机厂。主要生产中小型交流电动机、电力变压器。

1968 年建厂的银川市变压器厂是专业生产中小型电力变压器及电炉、矿用、整流等特种变压器，是部定点生产变压器的重点骨干企业。1975 年，正式生产变压器产品。

银川电器开关厂 1974 年 1 月建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银川电线厂是 1971 年 2 月在自治区工业局工业护厂处基础上，利用废旧的自制电线设备组建起来的国有企业，同年被列为一机部规划定点厂。

银川电焊条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69 年由生产墨汁、皮带蜡和矿蜡的三个街道集体小厂合并而成，于 1970 年正式生产电

焊条。1973 年被列为国家机械部定点生产电焊条的专业厂家之一。

（五）建材工业

1972 年，在永宁鞋业社的基础上筹建宁夏玻璃厂，建成一条制瓶生产线。1972 年 3 月建成投产。1976 年改建一条压花玻璃生产线。

（六）造纸印刷工业

1963 年，自治区工业厅投资 47 万元，对贺兰造纸厂进行技术改造。技改工程于 1964 年完成，改造后的贺兰造纸厂成为机械化造纸厂。三线建设时期，银川的印刷包装工业也有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各印刷厂开始大量承印毛泽东同志著作，为了提升装订能力和提高装订质量，各厂引进了折页机等，初步形成了半机械化装订生产线。1971 年，银川市彩色印刷厂引进了胶印生产线，灵武印刷厂、永宁印刷厂也购置了胶印机，使印刷技术实现了从石印到胶印的突破。

（七）纺织工业

银川毛纺织厂原名宁夏省毛纺织厂，于 1952 年开始动工筹建，1954 年建成投产。1965 年，纺纱车间从银川毛纺织厂分出，在银川市新市区重新建立了银川市亚麻纺织印染厂。1970 年 9 月，自治区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决定将银川毛纺织厂绒线车间改建为灵武绒线厂，交由灵武县管理，作为县办企业，实行区、县双重领导，以县为主，厂址设在灵武县，于 1972 年 9 月建成投产。

1958 年，纺织工业部批准筹建银川棉纺织厂，这是宁夏兴建的首个现代化的棉纺织企业。1964 年三线建设开始后，银川棉纺织厂改建为军工企业，厂房移交第四机械部组建新立织造厂，生产金属网。1965 年重新恢复建设银川棉纺织厂，1969 年建成投产。

银川亚麻纺织厂是 1966 年由地方财政投资 180 万元，以固原并入银川棉纺织厂的原有技术力量和设备为基础，在银川市新市

区（现西夏区）筹建的。主要生产亚麻防水帆布和消防用水龙带。

（八）医药工业

银川医药工业始于1958年银川制药厂的投建，1963年，因为制剂质量问题而下马。1966年初，化工部中国工业公司委托中国医药工业公司西安分公司帮助宁夏在永宁县兴建宁夏制药厂。1967年6月动工建设。1969年建厂设计方案基本完成。1970年，麻黄素生产车间建成投产。当年，兰州军区在灵武县城北门兴建灵武制药厂，1971年正式投产，主要生产麻黄素系列原料药。1974年，产品首次出口美国。1973年，宁夏制药厂的大输液生产车间建成，1974年正式投产。1975年，宁夏制药厂的青霉素粉针车间建成投产，填补了宁夏的空白。

（九）食品工业

1970年2月，银川糖厂变更番号，由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建设第十三师糖厂”变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糖厂”。同年3月18日，成功生产出首批“六盘山”牌白砂糖，计320吨。另外，还成功地试制出了65度糖蜜白酒。

五、结束与转型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之前所提倡的积极备战的方针随之降温。同时，随着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的缓和，国家开始逐渐撤出对三线地区的大力投资。1980年后，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再一次向东部沿海倾斜。

三线建设过程中由于错误的选址和建设，致使很多国有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效益不佳，三线企业效益尤其低下。同时，这段时间国家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线建设时期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随着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1982年，邓小平提出对国防工业要“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军养民”。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

部转产 15 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 and 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1986 年至 1990 年的“七五”计划,国家对效益低下的三线企业施行了“关、停、并、转、迁”等政策。按照“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则进行调整。国家允许部分效益特别低下的企业破产关停,将散布在各地的企业并入到一个企业;部分在山里、洞中的企业迁出至附近的平地或者附近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小城镇,将跨省的的小三线项目交由当地政府管理;允许并鼓励三线企业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军工企业生产民用产品。1983 年 12 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 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 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指导三线企业改造。在此期间,一部分企业成功进行了产品转化,比如制造包括坦克等军用车辆在内的重庆嘉陵机器厂开始生产摩托车,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商,川东造船厂成功转型为一家生产江轮的企业,绵阳的长虹电视机也是由一家军用电子元件厂改制而成的,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六、三线建设的时代意义

三线建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是一个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由于鲜明的特定时代特点,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三线建设褒贬不一,从宏观决策和微观效益方面都有很多专

门论述。应该指出，三线建设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的基础上，是新中国基本建设史的重要内容。因此，必然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时代意义。

首先，以爱国主义为根基。三线建设是以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为目标，因此爱国主义成为三线建设的内在诉求。具体体现在：第一，保卫民族独立、国家安全。三线建设就是在保卫新中国胜利果实的历史情境中开始的，对于普通的三线建设者，三线建设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三线建设则与这种爱国情绪相伴生，在建设中逐步深化。第二，对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1966年，毛泽东将“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由于历史的原因，60年代初，新中国虽然历经了数次成功的经济调整，但国民经济的实力仍然较弱，工业布局存在着东重西轻的严重不合理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线建设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摆脱落后状况，追求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的爱国梦想的实施。

其次，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在当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的条件下，三线建设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西部地区的一次大规模的传播，东部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西部地区扩散，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政府必然要承担起工业化初始生产性投资的主体作用，而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利益导向的投资。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艰难，全国支援三线，短期内集中大量的社会资源向三线地区大幅度倾斜，共同建设三线。正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三线建设展开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再次，以党的领导为灵魂。中国共产党是三线建设的核心领导力量，三线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形成和延拓离不开党的领导、推动和协调。可以说，党的坚强组织和积极领导是

三线建设的灵魂。正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精神力量，提升了三线建设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在三线建设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三线建设具备良好的外延性，体现了党的光荣革命传统，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当今时代仍有其生命力。

七、结语

三线建设是一场出于国防军事背景的区域工业化过程，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远超于国民党政府在八年抗战时期（1937-1945）的沿海工业内迁以及本世纪初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始于2001年）。在1964至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所在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亿元，占同期全国基础建设总投资的39.01%。

三线建设是一项巨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国史中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要想对它作出准确、客观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三线建设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并有效地缩小了东西差距，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63年，西部云、贵、川、陕、甘、宁、青七省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中国的10.5%，到1978年上升到全国的13.26%。三线建设改变了很多落后地区的面貌，许多交通不便甚至与世隔绝的地区通过大三线建设得以与外界联系起来，开始步入工业化时代。三线建设提高了西部主要城市如西安、兰州、重庆、成都、贵阳等的竞争力。四川绵阳、攀枝花，湖北十堰等地从农业占主导到建立现代化工业，更是直接得益于三线建设。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的号召下，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基础设施，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工业经济落后的面貌，建设了成昆

铁路，攀枝花钢铁基地，中国二汽等重点项目，将绵阳、德阳、贵阳等地从小城市甚至乡镇建设成为具有大量现代制造业和科研机构的城市。

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军工也要配套，像钢铁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进去。当时参加三线很光荣，所以最好的设备，好多重点企业都搬到西部，形成新的工业布局。三线建设在改革开放，国家政策再次向东部沿海倾斜之际，对内地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带动促进作用。三线建设对与促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的交流，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三线建设集中于军工业和重工业，有力促进了中国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也保护了国家的安全。三线时期积累的物资和工业设施、基础设施，也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打下一定的基础。

2017年10月